

非遗剧种唱出时代新调

刘美

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,非遗剧种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。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风雨洗礼,却依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从黄土高原的秦腔到江南水乡的昆曲,从中原大地的豫剧到西南边陲的傣剧,这些剧种各具特色,或高亢激昂,或婉转悠扬,或古典典雅,或灵动活泼。它们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。

然而,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,非遗剧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,非遗剧种的观众群体逐渐缩小,传承人也日益稀缺。许多剧种面临着后继无人、濒临失传的困境。但与此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机遇。在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高度重视下,在社会各界对非遗传承的关注与支持下,非遗剧种正在以全新的姿态重新“活在当下”。比如,拥有3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目的山东省,坚持守正创新,让非遗剧种唱出了时代新调。

剧目唱腔:赓续传统 弦歌不辍

非遗剧种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充满生机、持续繁荣,关键在于剧目和唱腔坚守传统,保留其核心美学特征。

2019年,济南市吕剧院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。自1951年建院以来,该院挖掘、整理、复排了《逼婚记》《龙凤面》《桃李梅》等传统经典剧目,多次获得国家、省市级奖项。其中,《逼婚记》发扬了旧本《温凉盏》的题材乡土性、人物传奇性,保留了大量方言俗语,成就了许多观众难以忘怀的“金句”。同时,该剧演唱方式继承和发扬了吕剧“中正平和”的美学特点,无论欢喜还是悲伤,演员的情感表达都是有节制的,既不生嘶力竭,也不矫揉造作,无不折射出山东人“温柔敦厚”的性格特征。该剧自1959年首演以来,被京剧、豫剧、秦腔、评剧等众多

人才培养:薪火相传 星耀梨园

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,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,繁荣发展戏曲事业的关键也是人。

剧种移植,创演六十余年经久不衰。

国家级非遗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杜玉珍认为:“山东梆子与时代接轨,必须要在传承中创新,即使创新会有所变化,但因为有传承的基因,也不会‘跑调’。”比如新编历史剧《运河老店》,继承了山东梆子的民间题材和乡土特色,以小人物视角展现时代变迁,讲述了清朝末年“东家夫人”孔月娇在丈夫去世后,打破女子不得经商的封建束缚,让家族生意走出国门的故事。杜玉珍在剧中扮演孔月娇,她结合角色的性格特征,遵循传统戏曲情感表达注重细节的特点,坚持“放中有收、收中有放”的山东梆子传统唱腔规律,完美诠释了“舍命梆子腔”高昂激越又悠扬婉转的声乐特色。

近年来,山东省陆续出台《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等多项配套政策,安排专项财政资金,加大对传统戏曲人才培养、剧目创作、非遗传承、院团建设的保障力度。如积极开展国家级非遗剧种代表性传承人抢救记录工程,组织推进地方戏曲经典剧目“音配像”工程,挖掘、整理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并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存储。在人才培养方面,山东省陆续推出“山东戏曲青年名家”“山东省戏曲名家工作室”“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持计划”等项目,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演出资源,培养出一批极具才华和潜力的青年艺术家。

创新发展:科技添彩 多元传播

随着科技的发展,数字技术拓展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内涵和外延,极大丰富了戏曲的舞台表现形式。2023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剧目之一的现代五音戏《长生》,改编自《聊斋志异》篇目《水莽草》,讲述了水莽鬼三娘放弃轮回的机会,与同窗祝生为伴,阻止水莽鬼祸害人间的故事。该剧巧妙地将数字技术和舞美设计相结合。例如,在三娘和祝生出场时,利用先进的全息图片和动态视频技术,打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场景,兼具视觉冲击力,又进一步拓展和凸显戏曲虚拟、写意的传神意境。同时,该剧在表现手法方面大胆创新,选用“小剧场”这一新兴的演出形式。在数字化沉浸式加持下的五音戏作品,使观众沉浸式体验了一场视听盛宴,受到年轻人的高度认可。除了现场演出应用数字化技术外,山东非遗剧种还借助广播、影视、动漫、互联网等传播媒介,积极探索多

元化传播方式。比如《幸福公寓的笑声》《考丈人》等吕剧电影、山东梆子电影《跑旱船》等。如今,拍电影已成为山东非遗剧种传播的一大亮点,山东戏曲电影无论在影片数量还是放映总场次等方面,都位居全国前列。《枣乡喜事》是国内首部以渔鼓戏为表现形式的戏曲电影。它通过两对农村青年一波三折、状况百出的喜事,折射出鲁西北乡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变。在保持传统戏曲渔鼓戏精髓的前提下,电影创造性地加入了现代乐队演奏,既缓解了大段唱段时场面的沉闷,又突出了渔鼓戏诙谐幽默的特征,更符合青年观众的口味。该剧获得多个全国性奖项,是非遗剧种在新时代传播和发展的成功范例。

非遗剧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,蕴含着人民的智慧、情感与生活百态。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,非遗剧种能在当今社会持续焕发时代活力。

慧眼评诗

早春晨行

王鸣宇

晨行堤岸侧,旭日吐朝晖。
林径人纷至,枝头鸟自飞。
雪消山渐瘦,冰解水增肥。
时序随更替,风柔柳眼微。

周殿龙评点:

这首五律写早春晨行所见。八句诗两句叙述,第一句交代出行时间:晨,地点:堤岸侧。第七句叙写时序更替。用六句描写所见景物,皆围绕这两句叙述展开。第二句大处着笔,展示出广阔的画面背景。三四句着眼于动态,人至,鸟飞。朴实自然。五六句写雪与山、冰与水。皆为因果关系画面。因雪消,故山渐瘦;因冰化,故水增肥。瘦与肥两个形容词十分精彩,用拟人手法突出了景物变化静态中蕴含的动态过程。第八句以风柳做结。因风柔而柳眼微,又是一个因果互动关系,既与其他五句景物描述协调一致,又与第二句遥相呼应,形成完整画面。此作未有一句抒情,而句句皆含作者对早春美景的喜爱讴歌之浓情。布局谋篇深得王摩诘手法真谛。

从地方小戏到文化名片——满族新城戏的艺术特点及其价值探讨

倪夕婷

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,少数民族戏曲由剧种是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,承载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品格、历史积淀与情感体验。满族新城戏作为东北地区的戏曲剧种,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其母体为满族说唱艺术八角鼓,最早在明·沈榜《宛署杂记》中有明确记载。在新时代,深入认识满族新城戏的艺术特点与价值,是传承和发扬这一剧种的关键。

满族新城戏的艺术价值

文化价值。满族新城戏由满族说唱“八角鼓”曲牌发展而来,艺术形态具有鲜明满族特点。发展过程中,说唱艺术改用汉语,促进满汉文化融合。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、世代相传,蕴含丰富满族传统文化及表现形式,见证满族历史发展。保护和利用满族新城戏,有助于深入了解满族发展历史与文化艺术,传承满族艺术文化。

满族新城戏历史沿革

满族“新城戏”以吉林省扶余一带流传的满族曲艺八角鼓为基础发展而来,2021年被列为国家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不同于东北二人转,它吸收满族民间音乐,行当以生、旦、丑为主,擅长表现悲欢离合或轻松喜悦的故事。

起源与流变。满族新城戏源于满族“八角鼓戏”,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18世纪末期,其从京城传入东北地区,与当地萨满调、民歌等艺术形式融合,融入戏曲元素后形成独特艺术文化。1960年,“扶余县新城戏实验剧团”正式成立,满族新城戏走上专业艺术发展道路,2014年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。多年发展后,其受众群体达500多万人次,《洪皓》《铁血女真》等成为经典剧目。2022年、2023年,满族新城戏《洒下一米阳光》《高风亮辅范文程》获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。

八角鼓。满族民间说唱曲艺“八角鼓”最早从北京传来,又称“京八角鼓”,1906-1914年发展最为活跃。当时八角鼓多在逢年过节或喜庆堂会受邀演出,日常在附近农村表演,采用多人坐唱形式,主唱者击打八角鼓,演唱形式多样。1959年,扶余县政府保护性挖掘整理“八角鼓戏”,建立专业剧团并命名为“新城戏”,为满族新城戏发展传承奠定基础。

满族新城戏的艺术特点

民族性。满族新城戏作为地方戏曲剧种,声腔独特,以唱腔板式变化为主,融入萨满音乐,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。萨满教在中国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广泛流传,在满族新城戏中元素众多,如经典剧目《红罗女》展现出悲壮的萨满音乐,呈现满族风情。其配饰和服饰因东北地区寒冷特性而独具特色,人物造型常用动物皮毛点缀,盔帽造型有满族神帽、达子帽、狼尾盔等,体现满族群体简单质朴、线条粗犷的民族特点。

现代性。随着时代发展,戏曲不断创新,满族新城戏也逐渐现代化。其价值追求、审美观念、表现形式和精神模式更符合现代人意识,艺术表现侧重以人为本,人物形象多元真实。如《红罗女》中满族公主形象,敢于追求所爱,理想破灭时以身殉国,展现满族女性的奔放勇敢,与传统戏曲女性形象不同。满族新城戏给人非静态凝滞和动态游移之感,与现代人流动生存状态相似,蕴含现代格调的审美意蕴。在音乐伴奏中,满族新城戏融入西洋管弦乐器,增强表现力。如《皇天后土》用神杆和鹿角变换展示满族鹿场兴衰,融合现代性和戏剧性,引发观众情感共鸣。同时,其挖掘民间现代性表达空间,传达丰厚人性温度和丰富情感内涵,体现独特神韵和文化特征。

民俗艺术性。满族新城戏在发展演变中展现民俗艺术魅力,融入满族习俗、舞蹈等文化元素。其最初表演遵循“四功五法”传统戏曲方法,后融入大量满族民间舞蹈语汇,如“三道弯”“登山步”等。《绣花女》融入满族民间舞舞段,“碎摆头”“摆膀”“腰铃舞”“歌舞劝酒”等动作刚柔相济、舒展有致,构建多面人物形

象。满族人擅长骑射、狩猎,《铁血女真》中弓箭手骑射舞融合“趟马”与马舞,展现满族男儿彪悍、粗犷的性格。满族女性在满族新城戏中的身段造型常见“三道弯”,尽显雍容华贵、优雅大方,展现女性身体线条美感。



近日,参观者在宁夏非遗麻编传承基地选购文创产品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银川市西夏区,今年以来通过深度挖掘当地文旅产业资源,将传统产业、非遗项目进行融合式发展,为企业搭建起非遗文创、特色葡萄酒庄、民宿等为一体的文旅融合发展平台,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。

王鹏 摄

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光彩

赵超



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时指出,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、民居、特色建筑风貌,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,不断焕发新的光彩。

民族文化是一个巨大宝藏,要利用这一优势,增强文化自信、化风育人,助推经济社会发展。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。从敦煌壁画的飞天曼舞,到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;从蒙古长调的悠扬辽阔,到侗族大歌的婉转空灵;从苗族的银饰图腾,到藏族的唐卡绘画……这些彰显着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瑰宝,宛若一颗颗镶嵌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閃耀明珠。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,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情感。因此,要以敬畏之心对待民族文化,以自信之态传承

民族文化,让民族特色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保护传承各民族传统文化,就要激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,推动其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在贵州黔东南侗族大歌传承人的吟唱中,一首没有文字记载的古歌通过短视频传播,让天籁传遍世界;在云南大理的扎染作坊里,白族姑娘将“风花雪月”纹样印在潮流卫衣上;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草原上,马头琴演奏者用电子混音演绎传统曲目。这些场景揭示着一个深刻的命题: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来自其时代性。因此,要从做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站位出发,让民族文化生生不息、永放光芒。

民族特色离不开全民参与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。贵州“村超”足球赛将苗族鼓舞与体育赛事融合,观众席上的蜡染服饰与绿茵场形成美妙对话。这些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,构建起民族文化传承的“毛细血管”。当每个个体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者、守护者、传播者,民族特色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,而是可感知、

可体验的生活方式。

深化文旅体融合,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。民族地区要深入挖掘和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,以乡村旅游为契机,在文旅体融合中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,彰显民族文化的光彩。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,深化以旅促文、以文促旅的融合模式,结合市场经济需求和时代特点,发展文化旅游产业,丰富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模式和类型。如通过“非遗+旅游”“非遗+文创”等方式,将传统的非遗文化元素融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当中,推出更多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文创产品。通过举办民族文化活动,将民族节庆打造成旅游产品吸引游客,增强民族文化的参与感与互动性,让游客在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中感受“活”起来的民族文化。

多措并举,促进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。站在文化自信自强的高度,民族特色要实现从符号提取到精神传承的跃升。就像三星堆青铜神树与现代光影艺术的对话,既保持着神秘庄严的仪式感,又焕发着科技赋予的未来感;苗族服饰中的百鸟图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,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

对自然崇拜的密码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既保持独特性,又具备对话能力,最终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跨越。提取这些文化符号时,也需要深入解读其背后的智慧、精神与信仰。

融合多种元素,促进古今融通。将民族元素融入现代设计、影视创作、音乐制作等领域,将民族特色与现代时尚、流行文化相结合,能够让传统文化以更加时尚、亲民的方式呈现。在时尚领域,把民族传统图案如苗族的蝴蝶纹、满族的团花纹等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,推出具有民族风情的时尚服饰;在音乐领域,将民族音乐与电子音乐、流行音乐风格相融合,创造出新颖的音乐作品。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解构,而是像种子在新土壤里扎根,既维持着文化内核的稳定性,又展现出适应时代的枝叶。

让民族特色文化“活”起来、“火”起来,还离不开创新呈现方式方法。保护传承好各民族传统文化,激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,推动其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中华文化的百花园必将更加绚丽多姿,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亦将更加光彩夺目。